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六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一期 ——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2f）

【研究评论】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华新民
【春秋史笔】	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胡 平
【自由论坛】	文革造反——国王与民众的结盟	谢选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

【研究评论】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 华新民 •

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国内的历史学者韩钢提出了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梳理。‘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直接动因要从毛本身寻找，毛的思想、心态、部署、动作，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这是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至于社会的、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识形态的那些因素，都是透过毛这个因素发生作用的，这是另一个层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文革’，这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这个‘怪胎’的问题。”〔1〕

本文试图就第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见解作一点回顾和评论。

毛泽东死后，中国官方对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被写在一九八一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它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作了这样的解释：毛做为执政党领袖，极为关注党和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形成了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毛将中共党内的不同意

见视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党内形成了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沿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说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2〕因此，发动文革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修正主义；是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在文革前直到文革后，中国官方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这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反修防修”。只不过从前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现在不这么认为了，而是说他的追求“带有空想色彩”，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换句话说，虽然文革是搞错了，而且错到要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从来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一种解释，在国内的文革研究文献中占主流地位。例如，金春明在他对于文革的定义中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3〕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这个“神圣目标”，而且把它写到文革的定义中去，赋予一种不容置疑和争论的地位。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这样一种评价由于官方的教育灌输，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中还有一些市场。如一九七零年出生的卢周来在“文革七问”一文中说：“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70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4〕他在这里强调毛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推动民主，让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这样的观点在经历过文革的人中可以说已经不多了，这少数人中有代表性的是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黄廉，黄廉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以“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罪名，被隔离审查，一九八二年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他出狱后在访谈录中说：“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5〕

卢周来、黄廉的这样一种认识，至少在文革的最初几年里，确实是大多数造反派、青年学生的一致共识。正因为人们当时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使得毛泽东在当时人民

心目中的威望比之文革前又大大提高，这是超出个人崇拜之外的建筑在理性认识上的因素。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展开，这样的共识逐步瓦解，以至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时候，人们用“秦皇的封建社会”来影射毛泽东本人和他统治下的中国，说明十年前在同一个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欢呼的人中，相当多数人已经抛弃了从前对毛泽东的崇拜，当然也抛弃了原先对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认识。也就是说，随着文革的展开，人们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从开始全心全意接受毛泽东自己的说法，转变为对此提出质疑，甚至进一步转变为完全抛弃。

不过这种质疑和抛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只是许多人心中的情绪，在当时中国的环境里也难以形诸公开的文字。中国政府开放留学初期，出国的人员大多有文革的经历，有些人就开始在留学生办的刊物上发表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文章。到了一九八六年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的时候，湖南省文革中的激进组织“省无联”的积极分子、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陷狱十年的杨小凯发表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文革的背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6）

杨小凯的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第一次以公开的文字表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自己在五十年代推行的经济路线彻底失败，遭到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集体抵制和党内公开的批评，受到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满甚至嘲笑，毛泽东自知理亏又难于忍受，发动文革是他反扑和扭转局势的一种努力。其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态有不理智的一面，这包括因为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而怀恨在心，因为有人嘲笑、讽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恼羞成怒。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文革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推行的“三面红旗”有关是显而易见的。然而，1981年官方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解释以及上述金春明的定义对此却只字不提，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发动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国内的文革时研究学者王年一早在1983年即已指出“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7）王年一上面这段话说明作者其实看出了其中的关系，甚至也婉转点出了毛泽东的意图是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然而大概是受国内的政治环境所限，他把更多的责任归在江青身上，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份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

表。”至于毛泽东的动机，他又在同一篇文章中为他开脱：“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对此他没有加以论证，给人以“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印象。可以说，在文革同“三面红旗”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上，王年一的这篇文章已经接近了杨小凯的结论。但是由于言论禁区的存在，他只是点到为止。杨小凯在海外发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一文没有言论禁区的约束，毫不含糊地说明了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不是什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死不认错。

显然，杨小凯当年积极投身文革时不是这样理解毛泽东发动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期支持学生和工人造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血统论”，使人们觉得他确有了为了“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揭露共产党政权的阴暗面的目的。杨小凯当初无疑是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他甚至觉得毛泽东的文革会导致“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8）。然而十八年后，到了一九八六年，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他把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还人权于民”的一些做法理解为只是为了动员群众击败政敌而打的一张“民意牌”，是他在处境极为被动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常规的“右的策略”（6）。毛泽东的这个策略确实很得人心，不管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又得到平反的人们，还是因为谨慎小心没有受到多少打击的人，都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新政策中，如“十六条”规定要保护少数，声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感觉到了一种1957年反右以来没有的宽松气氛。这种“解放感”激发了群众的热情，他们忘记了就在几个月前，报刊上还在批判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口号，也忘记了几个月前受到批判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的罪名就是影射和挖苦“大跃进”的失败。直到他们原来憧憬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成为泡影，现实中的“革命委员会”比文革前实行更加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后更加讲出身和成份，才变得困惑起来，反过来追问当初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杨小凯指出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失败同他发动文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他的失败如何导致文革的过程没有作详细的论述。到了文革结束二十年的1996年，王若水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一文中沿着杨小凯的上述思路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从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案入手，指出“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反革命’罪的。这一点，毛泽东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有隐秘的动机。要探查出这个隐秘的动机，就要弄清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真实原因。”（9）确实，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尽管不无认识上的错误，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蓄意地罗织罪状？所以一般的持有或接近官方观点的学人都回避这个问题，例如喜东在“‘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一文中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说成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认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10）。

王若水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枝节”，相反，而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揭示毛泽东的“隐秘的动机”，为此他作了如下的分析：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为了使中国赶上苏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

一笔帐？果然，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泽东拉开距离。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的书面报告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斯大林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王若水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下了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9）

王若水的文章除了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以外，还指出了毛的政治野心和对刘少奇的“蓄意罗织罪状”，这就明确地把毛泽东这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放到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他也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出了罢黜刘少奇的决定。

高文谦在他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做出了相似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高文谦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同王若水所说的“心病”根源是一样的，那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同王若水一样，高文谦也认为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在认真考虑解决刘少奇的问题。（11）

2005年出版的张戎和Jon Halliday 所著《Mao, The Unknown Story》一书对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分析同王若水和高文谦有着类似的思路。不同的是，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有同苏联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因素，也同毛泽东想把中国迅速建成一个军事强国的想法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为了更有效地把全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生产更多的钢铁来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征集更多的粮食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这条路线遭到严重挫折，也使毛泽东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威望受到打击。同王若水和高文谦一样，该书也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的转折点，他们根据对王光美、王力等人的采访和其他材料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按照毛泽东原来的用意，“七千人大会”是为了代替按党章应当召开的党的“九大”——毛担心由于“三面红旗”的失败，如果召开正式的党代会自己会被选下去。根据毛的安排，中央先预备好一份决议的草案给大会定下调子，

草稿里笼统而轻描淡写地承认过去几年里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而且宣布在新的一年里再来一个大跃进。会议的头两个星期没有全体大会，分组对这份草稿提出意见，由于与会人员不能互相交流，而且由于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寒蝉效应”，人们对草稿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修正。然后在全体大会上由刘少奇来宣读“集中”大家意见之后的定稿。这样毛泽东既可以把意图变成党的决议，又可以使全体出席会议的人为这个文件共同负责。然而，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出其不意地离开了原定的调子，用作者的话说，是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当着毛的面在七千党的干部面前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过去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不仅没有大跃进，反而退了许多；成绩和缺点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刘的讲话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在出席会议的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刘少奇讲话的鼓励下，他们纷纷大胆直言，表示再也不能继续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了。这就使毛泽东不得不延长会期，把林彪请来发言以抵消刘少奇讲话的影响。林彪以军队首领的身份，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肯定，毛主席一贯正确；这几年的困难只是交了点“学费”；“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更加紧跟毛主席。”林的讲话阻吓了出席会议者的对毛泽东灾难性经济政策的深入批评，使毛泽东得以过关。据王光美对该书作者说，刘少奇见到林彪出场就嘀咕：“林彪来讲这样的话，麻烦了。”不过毛泽东从七千干部在会议中表达出来的强烈情绪中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在一月三十日作了建国以后唯一的一次公开自我批评，并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不得不放弃严厉的粮食征购计划。这是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大一次挫折。他竟然给平时小心翼翼的刘少奇赢了一着棋，又等于被当时全国的当权派喝了倒彩。这使他认识到从上到下的整个干部体系不是他的治国路线能够依靠的对象，相反，从此时此刻开始，毛泽东内心对刘少奇和所有出席会议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党滋生了满腔的怒火，国家主席和党的骨干成了他复仇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要发动文革让刘少奇和大多数出席会议的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地狱之苦。（12）

《Mao, The Unknown Story》一书的作者在王若水和高文谦提出的“心病”和“恐惧感”以外，还加进了毛泽东对广大干部的愤恨。看得出来，他们除了试图回答王若水提出的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和心理因素这个问题，也试图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比如他为什么不仅贬黜了刘少奇，而且要罗织罪名陷害他；又比如毛泽东为什么打倒刘少奇之外还要使整个党组织以及各级干部受到冲击，而且放任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对他们施行暴力。

从杨小凯到王若水、高文谦和《Mao, The Unknown Story》的作者，他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同所谓“追求完美的社会主义”这一类理想主义、神圣目标无关，而应该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刘少奇以及其他高级干部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红旗”）分歧中去探求。这种观点同官方说法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近年，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突破官方设置的禁区，接受和认同上述杨小凯到张戎等人观点。例如韩钢就认为毛发动文革的“直接原因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高层的分歧”。而且认为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这个分歧的起点，因而也是毛发动“文革”的起点。作为这种认识的佐证，他认为一九六六年毛写《炮打司令部》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1）说明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四年前的七千人大会始终在他的心头，他要算这笔账。

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介于二者或兼蓄二者的立场。例如学者高华认为：“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13）这种说法照顾到了两种对立的因素，既有理想主义、乌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权旁落的恐惧感。

高华在论述六十年代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时也提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他说，“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但是不同于《Mao, The Unknown Story》里的说法，他认为当时刘少奇没有对毛泽东“突然袭击”的意思，在大会上还是想为毛泽东开脱的：“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13）

高华同张戎等人这种差别，给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深入研究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课题。刘少奇在大会上究竟是冒着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风险试图阻挡错误政策的继续，或者只是希望通过为毛泽东开脱劝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新政策？如果是后者，王光美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是不是有事后为刘少奇添加“烈士”色彩的嫌疑？这些问题的澄清，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收集和研究。

高华虽然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这表现在他在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对官僚体制和干部特权的批判，例如他提出了“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概念，直到后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但在同一文章中，他揭示了毛的这种追求的前后不一致性：“在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五十年代，毛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尤其不允许进行工农收入的比较。”我们知道，梁漱溟曾经提出过工农差别的问题，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现在却连“八级工资制”也成了他不满的对象。“广大农民看病难，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此相对照的是等级严格的干部保健制度，这种医疗保健制度由来已久，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过去毛未曾严厉批评。”现在却把卫生部斥为“城市老爷部”。“毛批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说到底，特权行为是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共产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然而，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就批评过这种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年，一些知识分子和群众又提出这个问题，被指责为‘攻击党的领导’，‘挑拨党群关系’，都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在中国，在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过去托洛茨基解释这是‘工人国家蜕化’；以后南斯拉夫的杰拉斯（即旧译德热拉斯）说，这是‘新阶级’，苏联人骂杰拉斯是‘修正主义者’，中国也骂他反动。”而现在毛泽东自己也批判起“官僚主义者阶级”了。“毛在六十年代以前长期默认‘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规则的，这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铁的逻辑，给全国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毛好像改变了”。如何解释这种种前后矛盾呢？高华认为“可能毛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干群关系表面好像没有问题，但矛盾在增长，苏联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也存在。”（13）

高华没有看到的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在五十年代，毛是在第一线领导党的各级干部，所以“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退居二线后的局外人的地位使他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问题；而刘少奇以下的各级党的领导正在纠正他的经济政策错误，而且居然做得颇有成效，在干部中深得人心，毛泽东自知在经济政策方面已经没有资本争取人心，因此不再过问经济政策，这同他在一九五七年及以后的几年中具体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甚至钢铁、粮食产量的年度指标成为鲜明的对照。然而他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他的妒贤嫉能和急于扭转局势的心理使他把目光转到“阶级斗争”和干部特权这样一些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领域。

虽然高华不否定毛泽东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也觉得毛泽东的理论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

“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等于又回到了文革前的逻辑。他还指出毛泽东自己言行不一之处：在毛泽东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之时，却让有关部门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9级调到6级，月工资342.70元。又如对干部特权表示深恶痛绝的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却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13）总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里有没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涉及到毛泽东的心理活动，很难有确切的证据。即使是不否认他有这方面动机的真诚研究者也会被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困惑。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认为毛泽东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动机的论者多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言论和在他指示下发表的官方讲话和文章。这种观点假定毛泽东的言论都反映了他的真实内心思想，因此除了引用他的话以外，未见做很多深入研究，如卢周来在“文革七问”一文中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4）他在这里对于毛的讲话是基本采信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反复”地说他不说假话。

否认这种动机的论者，如杨小凯、王若水、高文谦和张戎等，则是试图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党内同事们的分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毛泽东的心理状态，追寻毛泽东言论背后的隐秘动机。笔者认为这是具有历史观的正确思路。但是由于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的缺乏，近年的一些个人回忆材料不免都带有个人视角的限制，还有许多艰巨的考据和索隐的工作要做。

注释：

- （1）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
（见 <http://www.lsfyw.net/political/yuelu/unite/qzfz/200508/3893.html>）
- （2）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六月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4/cr214.hz8.html#2>）
- （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4）卢周来：“文革七问”（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1/cr95.hz8.html#5>）
- （5）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
（见 <http://museums.cnd.org/CR/HuangLian.htm>）
- （6）杨小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1986年第四期（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4/cr227.hz8.html#1>）
- （7）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9月30日（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1/cr113.hz8.html#2>）
- （8）杨曦光（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http://museums.cnd.org/CR/ZK99/zk189/hz8.html#2a>）
- （9）王若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十月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98/zk145.hz8.html#2>）
- （10）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96/zk83.hz8.html#2>）
- （1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86—89页
- （12）Jung Chang & Jon Halliday:《Mao, The Unknown Story》，Random House, 2005，470—479页

〔13〕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2003
(见 <http://museums.cnd.org/CR/ZK05/cr302.hz8.html#1>)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春秋史笔】

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 胡 平 ·

## 一、毛泽东热貌似民间自发，实为官方诱发

毛泽东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虽说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到底有多热不无争议，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国覆灭后的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共二十大后的俄国没有斯大林热，而直到毛泽东死去三十年后中国却还有毛泽东热，可见毛热确实是独特现象，是需要我们分析和解释的。

其实，我上面的叙述就已经暗含了答案的线索。第三帝国是被盟军打垮的，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被盟国占领，纳粹的罪恶受到彻底的清算。赫鲁晓夫代表苏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尸体被迁出红场火化，斯大林的错误受到虽然不彻底但也十分猛烈的批判。而在中国，毛泽东却被中共当局作决议七三开，继续奉为伟大领袖，对毛的公开批评刚启动就减速就刹车，此后就是对毛的颂扬（尽管调门有所调整）。毛的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俯视众生，毛的遗体至今仍安放于天安门广场中央供人瞻仰。中、德、俄三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是如此不同，无怪乎有毛泽东热无希特勒热无斯大林热。

不错，正如陈小雅指出的那样：“在毛去世以后的，最早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坛’的，并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运。”

但必须补充的是，这里的“命硬”，是要把毛死后的命运也包括进去的。斯大林也横行霸道，也寿终正寝，但死后却被焚尸扬灰，于是威风扫地，神光褪尽。按说，邓小平是被毛两次打倒的人，理当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事实上，邓小平在许多政策上（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的非毛化要比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走得更远，可是邓小平们却还是要继续供奉着毛的神主牌位不敢动，这岂不更加证明了毛的“命硬”？设想，假如毛死后的命运和斯大林一样，也被斥为暴君全盘否定，也被焚尸扬灰，举国上下深揭狠批，再加上老婆被抓，侄子被囚，毛该受到何等的嘲笑啊！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还会有多少人叹服毛的“命硬”，把毛视为天下无敌的神灵呢？

由此可见，毛热的兴起，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却是被官方诱发的。九十年代初兴起的毛热不是官方有意制造的，它并不是官方有意图行为的产物，但确实是其副产物。

## 二、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力的崇拜

公车司机把毛视为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说来实在荒唐透顶。普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人比毛更见不得老百姓平安过日子发财致富的了。为什么他们不拜别人要拜毛呢？就在中共领导

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理由被视为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其实，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受到这些人的崇拜，不是因为他生前最保护人民的平安与财富，而是因为他拥有最大的权力，君临天下，作威作福（按：“作威作福”一词的本意是，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予）。毛独揽生杀予夺的大权，人民的安危祸福全仰仗他老人家的意愿，所以必须顶礼膜拜。

公车司机挂毛象这件事反映了中国一种传统的迷信方式。在这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不是因为他善良与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是谄媚，是行贿。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或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只因为它掌握着既能造福又能为祸的水资源，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为什么有毛热而无邓热？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厉害，因为邓只是毛的下属，因为在权力斗争中，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这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对毛的崇拜还有所不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毕竟还包含有对毛思想的认同。那时，人们不但挂毛像，唱毛的颂歌，而且还读毛着读毛语录，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装头脑，照毛的指示办事，做毛的好战士。而上述公车司机挂毛像这一类毛热则无此内涵。他们之崇拜毛，仅仅是因为毛的赫赫权势而已。

在权力崇拜的迷信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间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死后会成神成仙，他们生前支配人们命运，死后仍然能够支配人们的命运。这和宗教信仰大不相同。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毛泽东生前作恶多端，那么，不论毛死后在人间还受到如何的尊崇，但是在信徒们心中，毛一定已被罚入地狱饱受无尽的煎熬。宗教信仰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矫正，而上述那种迷信却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继续与延长。

只要中共官方还在继续崇奉毛，迷信者们就会继续视毛为神化的偶像。李志绥写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后不久突然死于家中，就有流言说李志绥是遭了报应。这个报应可不是宗教信仰的因果报应，因为它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恰恰相反，它相信的是那个主宰中国人生死命运的暴君在死后依然拥有这样的力量，暴君生前不可冒犯，死后也不可冒犯。

### 三、要消除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

因为权力崇拜是以权力为转移的，所以要消除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象现在这样，对毛的清算与批判还只能在海外进行，在国内则只能零星地出现在非主流媒体，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毛的崇拜是对权势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不问善恶是非的，只要死去的毛还被后来的权势者们继续尊崇有加，我们对他的批判就不大可能动摇毛在那些崇拜者心中的地位，有时说不定还会引出相反的效果（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批判毛）。那些崇拜毛的人会想：毛真是太厉害了。他干了这么多坏事，死了这么多年，别人还是拿他没办法，不管你们怎么揭露批判，还是不能撼动他的神主牌位。不服行吗？

在八九民运中，三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鸡蛋，六四后被判刑（不是以损坏公物罪，而是以反革命罪），刑期竟比那些民运领袖还长。这表明在中共当局心目中，亵渎神像是头等严重之事。如今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暴君，生前不可一世，人莫予毒，为所欲为，可是死后不久，甚至死后多年，被反叛者掘墓鞭尸，那以后，围绕着暴君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就烟消云散了。由此可见，为了消除那些迷信，我们常常需要消除那些象征物。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将毛遗体迁出天安门毛纪念堂，摘除天安门毛像。当然，仅仅是消除象征物还不够，重要的是要消除被象征物所象征的那种权力。这

就是说，我们必须消除由毛泽东所开创的共产党专制政权。

#### 四、恶的致命吸引力

不错，在今日中国，大多数崇毛者恐怕未必象上述公车司机那样迷信，以为死后的毛仍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对毛的崇拜也同样是出于对权力的崇拜。

在《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一文里，我曾对崇毛心理略加分析。其中写道：“人生一世，谁不愿意给社会、给历史留下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毛的罪行已被日益揭露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毛崇拜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从毛身上看到了人追求不朽的强大冲动。至于说毛的作用是好是坏，那对于他们倒是第二位的事情。更何况，大奸若忠，大恶似善。现代暴君都穿有一件理想主义的斑斓外衣，崇拜者总可以从暴君身上找出某些合理或正确的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他不把善恶之分列于首位，如果他不珍视自己也不珍视他人的自由，如果他对暴君的罪行没有愤慨以及对暴政下牺牲者的苦难不抱同情；他就很容易被暴君的巨大身影和辉煌成功弄得眼花缭乱，转而向暴君认同，并从这种认同中自视高人一等。”

眼下正好有一个例子，简直像是为我上面这段话作图解。王安忆小说《遍地枭雄》里的“大王”就是这样一个毛的崇拜者。《遍地枭雄》写到三个劫匪，为首者大王爱读书，肯思考，出口成章，颇具性格魅力，对人生对世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虽然干的不过是拦路劫车的小勾当，手下只有两个小喽罗，却心雄万夫，豪情万丈，指点江山，志在天下。大王平生最看不上眼的是艺术家，说那是雕虫小技。哪比得上人家帝王，帝王只须玩泥巴（修长城，挖运河），就在地球上画下了沟壑。大王感慨道：中国好啊！好就好在泱泱大国，国和民讲的是普天下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崇尚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指气象。美国也很大，可是总统是选出来的，一点王气也没有了。四面八方谈判，讨论，分选票，再数选票，国不国，君不君。天下就是要打出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大王最崇拜毛泽东，因为毛一身霸气，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从山沟沟里巴掌大一块地方打出个红色江山。这就是气象。大王带领兄弟们驱车北上，最后要到北京，首先第一，就要去毛泽东纪念堂。

历史学家高华在谈到毛热时指出：“毛是历史上那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所谓‘君师合一’也。毛一生打平天下无敌手，即便应对世界超强苏美两国的领袖，毛也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中南海游泳池畔穿着泳衣会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书房等待尼克森的觐见，此正适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和‘华夏中心’的心理。中国农民不理解，也不会接受华盛顿，但肯定敬畏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的许多情况下，统治者越强硬，统治手段越凌厉，百姓反而越佩服皇帝（当然有一个底线，即不能搞到官逼民反的地步）。因为中国人只崇拜强者，胜者，王者，毛的巨大的事功，毛的统治风格正好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要。”

其实，英雄崇拜，伟人崇拜，对王者气象或霸气的崇拜，都并非中国人或中国农民所独有。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用毛泽东的话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类之间的战争绝非只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正像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所问到的：“为什么为追求象征价值、声名或认知而乐于杀人或被人杀的人，比那些接受挑战也愿意让步，并将自己的要求提请和平仲裁或审判的人，更有人情味呢？”就因为前者出生入死，最能体现出人克服其动物性生存本能的伟大力量；就因为前者追求的是称王称霸，最能使自我意志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实现。相比之下，在奉行“你活我也活”原则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个人追求声名或权力无需再冒生命危险，但因此也就使争

斗少了你死我活的惊心动魄，不复有赢家通吃的血色辉煌，个人意志无从尽情任意发挥，那岂不是很不够劲很不过瘾吗？

## 五、我们是怎么转变的？

如前所说，甘冒生命危险，追求不朽，追求承认，这本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它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超乎善恶之外，就像那句老话——“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它可为大善，也可为大恶。问题在于，那种你死我活的追求独霸天下的斗争的结果每每导致专制独裁，导致一个人君临天下而亿万人沦为奴仆。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对独裁者表示崇拜是出于怎样一种可笑的角色认同：你崇拜独裁者，是因为你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为什么不把自己想像成独裁者之下的牺牲者呢？成为后者的可能性不是要大得多得多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时代过来人——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一代——的教训刻骨铭心。想当年，我们也曾热烈地崇拜过毛泽东。一来是崇拜他的伟大，二来是以为在如此伟大的时代，人生的价值将获得更充分的实现。文革狂飙突起，毛鼓励青年学生造反，一大批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突然被放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受到万众瞩目。这就极大地激发起年轻人的野心或曰雄心，激发起他们的表现欲亦即要求得到承认的冲动。当红卫兵们宣誓“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高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那既表明他们对毛的追随，又表明他们以毛为榜样的自我期许，同时也表明他们自以为生逢其时，已经得到历史承认并将得到更大承认的骄傲与展望。可是没过多久，这一代就从飘飘欲仙的云端上重重地栽了下来。我们终于意识到，毛的随意挥洒的巨人气象，是以他人不得随意挥洒为前提的；毛成为巨人，是必然要以把我们都压缩成侏儒为代价的。梁启超批判君主专制时说：在君主专制下，一夫刚而万夫柔。黑格尔也说过，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毛时代则把这一点发展到登峰造极。毛泽东君临天下凡二十七年，七亿人只准有一个头脑。毛泽东一个人霸占着中国这块大舞台把戏唱足唱够，害得其他人都枉过一生而轮不上任何独立表演的机会。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彻底否定毛泽东。

就这样，对伟大领袖的狂热崇拜就转变为对专制暴君的无比痛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一转变的最确切的证明。在四五运动中，最振聋发聩的一个口号莫过于那句“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知道，秦始皇是一个多义的符号，他常常被当作暴君的代表，但也一直有人称之为伟人，称之为“千古一帝”。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在四五运动的那个口号里，秦皇无疑是被当作暴君、当作大独裁者的符号。这表明一种根本性的立场转变：当人们提到毛泽东或秦始皇这类大独裁者时，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认同于大独裁者或独裁者的宠臣，而是把自己认同于暴政下的牺牲者。在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写道：“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可见，这一代痛恨毛泽东的最大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遭到抹煞（“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

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理解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胜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们才可能最大可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定人的野心和抱负，它只否定专制独裁，也就是说，它防止个别人意志的无限扩张从而堵死了其他人伸张意志的机会。它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这就为其他人施展野心和抱负保留下足够的空间。毛一度被称作伟大的诗人。其实，毛诗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气魄大。民主的政治领袖中也不乏文采飞扬之士，如伯利克里、杰弗逊、邱吉尔，但是你们从他们那里读不到象毛诗词一样的大气魄。正如同民主政治领袖常常做不出专制暴君所能作出

的那种大手笔的功业。但是，那对于我们大家不是更好得多吗？

毛时代的过来人，经历了从对毛的狂热崇拜到对毛的深切痛恨的转变过程。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经验充分地传授出来，至少可以使得以后的几代中国人产生免疫力，不至于再为独裁者的巨大身影而倾倒。可惜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压制对毛的彻底批判，继续维护毛的伟大领袖地位，顽固地拒绝民主改革；九十年代以来，中共还通过多种方式宣扬毛的所谓丰功伟绩，再加上文学和影视中大张旗鼓的帝王故事，这就引诱一些人——尤其是那些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重蹈覆辙。

## 六、借钟馗打鬼

有一幅广为流传的照片：东北地区的国企工人游行请愿，高举毛泽东的画像。

我们知道，今日中国的毛泽东热主要是普通人搞起来的。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农民从来不是毛泽东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特别是工人，他们是毛泽东政策的受益者。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又沦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所谓毛热，就反映了他们对毛时代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与抗议。这种解释不是没有根据，但不完整，不深入。

本来，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挨个得罪了个遍，以至于到头来居然找不出哪一种人可以算得上既得利益者，那在历史上倒真是很少见的。“四人帮”被打倒，举国欢庆。全国人民——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职业——都欢欣鼓舞地告别文革，可见文革之不得人心，可见普通人也不喜欢文革。

再者，一般人在对某一事物作价值判断时，并非仅仅根据一己之得失，那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公理，是否符合公正概念。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他们就不大好意思炫耀自己的幸福。我并不要夸大人性中的公正倾向。我只是说，除非人们能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予以合理化，否则，他们就很难仅仅因为自己是受益者这一点就去理直气壮地维护那种运动或体制。希特勒搞政治迫害，发动世界大战，其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和外国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并不是受害者，其中不少还是希特勒政策的受益者；可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却并没有多少德国人公开表示对希特勒的怀念。原因就在于，德国人承认希特勒犯下了严重的反人性反人道的罪行，因此他们认为，即便自己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受益者，也不应该为之唱颂歌。

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于建嵘提到他和安源工人的几次深入交谈。不少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确实怀念毛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谁要提到自己是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现在呢？人家一顿饭的钱，就是我们一年的工资，而且我们的工资还没保障。”老工人说：现在的生活确实好一些，但是社会不公平，我们工人没地位。一般年轻工人并不愿意回到毛时代。其实，那些老工人也未必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对于他们，毛是表达不满的符号。

现在有种普遍的误解，以为在文革期间工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事实并非如此。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讲到“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文革期间，股市全面下跌，工人股也不例外。只不过相比之下，工人股跌幅最小而已。

老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是不难理解的。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保障。毛时代实行低工资制，这等于强迫大家买高额保险，后来搞改革却轻易地把工人解雇，这等于吞掉人家的保险金。许多工人至今仍不肯抛弃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主人翁的神话，不愿意把

自己仅仅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看上去是对市场经济的抵触，其实有它的道理。因为当年共产党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企业属于集体或属于全民。然而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员们却利用手中权力把公产据为自己私有，形同抢劫，工人当然不接受。工人们有理由质问：如果我们工人不再是领导阶级，你们共产党凭什么还是执政党？如果我们工人成了打工仔，你们厂长书记的凭什么就成了资本家？在今日中国，工人没有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他们进行集体抗争要冒很大风险。他们抬出毛的画像无非是借钟馗打鬼。

## 七、怀旧情绪与商业品牌

前些年，《红太阳颂》的歌曲磁带一度风靡大陆。这不足为奇，就连海外民运人士开会联欢唱卡拉 OK，许多人也是唱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那些歌曲陪伴他们走过了青春岁月，因此当他们回顾过去的时光时就免不了要想起这些歌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变动不居，其变化的规模之大，令人身不由己；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由于变化来得太猛烈、太频繁，它使得昨天都显得极为遥远和毫不相干，而人又是那样地不愿意失掉过去，所以在中国，怀旧之风就很盛。当年毛泽东运用政权的力量，采用各种方式，从文字到音像，给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使之成为国人集体记忆中的重要部分，所以当人们回顾以往的时候很难摆脱它们。这种怀旧又因商业化的力量而如虎添翼，但是它未必说明多少政治问题，因为这种怀旧只是出于情绪。它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当毛时代的人过去了，那种带有毛时代特征的怀旧情绪也就过去了。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毛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化的产物。商业讲究品牌，讲究知名度。当今中国，还有比毛更出名，更适合做招牌或品牌，更便于广泛吸引顾客的么？韶山的农民说得很明白。他们说：以前，谁知道我们韶山呢？如果不是毛主席，特别不是因为文革韶山走红，我们今天的韶山还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我们这里的农民平均一人四分地，如果我们不利用毛老乡搞旅游商业，我们韶山的农民就要受穷的呀。陕西的农民说，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秦始皇。我们韶山不也这样么，翻身全靠共产党，发财全靠毛泽东嘛。希特勒比毛泽东更出名，用希特勒作商标，把希特勒的故乡或故居开辟为旅游景点，想来一定很赚钱。但是没人把希特勒做品牌招徕生意，因为那样做势必会引发强烈抗议，甚至会遭到禁止或取缔。这再次证明，诱发毛热的主因还在于中共当局，在于中共当局对毛的维护和对批毛的压制。

## 八、小结

把希特勒和毛泽东作比较颇有启发意义。希特勒和毛泽东都是魅力型领袖，他们都曾经赢得人们的狂热崇拜。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面，在建立强大国家一雪历史耻辱方面，他们都曾经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在这些方面，毛不如希，甚至远不如希——想想大饥荒就够了）。他们的名字一度都成为国家和时代的象征。他们都是暴君，杀人无数，害人无数。但不同的是，希特勒杀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国人，毛泽东杀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国人。毛泽东一生杀死害死了至少六千万以上的无辜苍生，其中本族人本国人起码占 95% 以上；还不是在战争时期，而是在和平时期，不是在打天下的时期，而是在坐天下的时期，不是对荷枪实弹的反叛者，而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战友。既然在德国都没有希特勒热，在中国更不应该有毛泽东热。其实，德国人并不是没有崇拜希特勒的，也许还不止一小撮，但他们多半在暗中，不会太张扬。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中国却有毛泽东热（注意：中国的毛热产生于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四之后）。于是我们又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论断。是的，对德国无希特勒热而中国有毛泽东热这一点来说，除了用中德两国政治气候的不同来解释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自由论坛】

文革造反——国王与民众的结盟

• 谢选骏 •

文化大革命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几十年的“国王—人民的联盟”十分相似，而且也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并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运动过后，君权确立，贵族和民众同样元气大伤，但却为即将到来的第三等级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及其过后的改革，客观上就是在准备一场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改革的主导者邓小平却对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充满恐惧，因此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抨击民主自由的中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凡此种种，都可以追溯到其不幸的文革经历。

——作者题记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谈论“文革”的人多，观点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是在客观讨论问题，而是在忆苦思甜，在扮演满身创伤的受害者角色，怀着形形色色的义愤，从事着事后聪明的假设。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工作班底的分裂——部分毛党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祸起萧墙，干掉了其他毛党：甚至毛的侄子毛远新、毛的遗孀江青，也遭到其“接班人”华国锋的暗算，这次政变被叫作“粉碎四人帮”。然而，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实是以偏概全。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1969年的中共“九大”“团结起来”的口号中——文革派与走资派团结起来，共同镇压了毛泽东利用完了的革命群众。

一、文革的进程

1966年5月16日发表《五一六通知》开始，到8月老毛亲自下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老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了即将发生的群众自主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团结起来”，下压群众自主革命，外骂“美帝苏修”以转移视线。

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间的“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进攻）和1969年—1976年间的“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清算群众）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动荡、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

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简单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被毛泽东煽动、利用、直接支援的学生和群众，通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方式，夺取了基层政权；而后又被毛泽东联合党政军尤其是军队内的走资派一手镇压下去。用“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的名义，甚至把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用“一打三反”（1970年）、“清除五一六分子”（1971年）的名义，彻底报复了一切曾向各级党委造反的革命群众。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党羽已经用“革命的大联合”铲除了异己，并把广大学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流放到穷乡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由文革派和走资派联合组成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称此为“上山下乡很有必要”。这样的大流放之后，被人民革命（“造党委的反”）冲毁了党的机器，再次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建立起来，并一个一个严厉清算参加造反的人民，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人人过关”。

老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1979年利用“西单民主墙”摸打民意牌和利用党内民主派清除凡是派，而后翻脸不认帐，关闭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如出一辙。有识之士说毛公公曰：“过河拆桥”，邓公公亦如是也。“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鞋，占领了学校，也就搅乱了学校，为毛泽东这位不安心图书馆工作的前图书管理员，出了一口年轻时代残留下来鸟气——这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所谓“人民文革”的死刑判决书。“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所开的一场追悼会。“继续革命”在老毛的主导下变成了“继续镇压”——十七年的黑线开始复活。

二、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造反，镇压是自上而下的整肃。革命与镇压的不同基调，构成了文革的两阶段：1966年—1967年的革命阶段与1968年—1969年的反动阶段。

在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个阶段并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被老毛控制的。当学生们在1966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向他老人家卖弄风情时，他老人家一定在刻毒地嘲笑这些少不更事的笨蛋正在落入他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学生们在1967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思春歌曲时，他们的冲动其实也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的权威”，而是试图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反对压迫的人民英雄。

但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上山下乡运动”以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之间的一本血泪帐，不是革命，而是清算革命——充满了宫廷的阴谋如“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小党棍之间的倾轧，戏剧性地体现在毛的左右手之间——坐在毛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毛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钩心斗角绝不是无产阶级的。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的绝妙讽刺和清晰说明。

这些蝇营狗苟的故事，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承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关河空锁祖龙居”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指挥失灵”的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中国、辐射全世界、从此将与共产主义运动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1980年代出现

的“思想解放”。

按照上述观念，“文化大革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再加上一年扫尾时间。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还说这场革命“在继续深入”，那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声东击西，指鹿为马了。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结束于“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这两个时代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阶段”开始于1969年，结束于1976年。

综合起来可以说，主导文革的毛本人，一人就变脸扮演了三个角色：1、雅各宾党人（1966—1967年）；2、热月党人（1968—1969年）；3、拿破仑（1969—1971年）。

例如，文革中北京五大造反派头目（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以及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1971年后都被毛派当局隔离审查，而在1979年以后，又被邓派再度逮捕惩罚。

可惜老毛这个“背叛了文革理想”的“中国的热月党分子”、“中国的拿破仑”并不敢打出国境，只敢在边界上和苏修搞搞磨擦，小打小闹。两年后（1971年）因为听说苏联可能要收拾往日的仆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因此恐慌，不得不向美帝跪地求饶。而对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存有疑虑的副统帅林彪，也就像抹布一样遭到了无情地抛弃。1972年乒乓外交之后，毛更是放弃了所有的“无产阶级理想”，向西方全面投降，比早年的“抗日英雄”袁世凯晚年向日本屈膝投降，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头一看，林彪—四人帮的垮台，何尝不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代表的党机器一起镇压革命群众（“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不需“彻底擦亮眼睛”，就能看破老毛“变脸游戏”的此中分际。

三、文革的动力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小集团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得一穷二白的人民长期酝酿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他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欲望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群众互

毆，也不至于无法继续其政治游戏。然而即使毛泽东自己也清楚，对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黑线专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蜜月，其实是难以持久的野合。

1968年以后，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群众不满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社会制度的改良也无从说起；同时，由于文革造反“冲击”的人过多，进一步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不仅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它的许诺却始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到毛自己身上，并在民间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老毛不死，国难不止”。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难理解，1976年10月上节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人们，其实是在庆祝毛的死亡。这都是因为，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1968年以后就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逐渐消退，在1971年以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深入一层，增加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欲望，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统治的厌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文革的行为模式因此很像二十世纪欧洲最流行最时髦的行为模式：不是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滞后性，六十年代重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肃反。

总结一下文革的动力分析：

（一）两股合力的社会分析：A：僭主要阴谋；B：人民要伸冤。

（二）两股合力的心理分析：A：“社会的精神病”；怀疑狂以“革命”为护身符，结果导致互相迫害；B：压抑下的人性：从被迫造反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的动力形态决定了其有斗批改有“斗”、“批”而无“改”的历史命运；其结果造成了“文革拖延不决的‘改’最后演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一历史的滑稽戏。而作为其中间环节的、初步结束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不过是使社会初步回到文革前的整肃阶级敌人的模式中去了。

四、文革的象征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一）打倒特权阶级、消除官僚压迫；

（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进行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型社会。

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作？这是另一回事。但它通过授权人民造反的煽动，提供给文革以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1966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各级党委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终身流放、牢底坐穿的厄运！难怪当时的党委干部攻击学生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右派向党进攻”。至于在1966年8月—12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势力的活动，是由党委高干子女们带头干下的“自上而下”的镇压行为，这和后来火烧党委、炮轰书记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行为，具有“向党进攻”的性质，方向完全不同。所以造反派据此指责保皇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在这样的理想下，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物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属于红卫兵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墓地里的鬼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只有那样，“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命运，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亲手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僭主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和渣滓”的意义上，这些过去时才可能在一起凑成一个可怜的整体。他们的受害并不是出于殉难，不论是主动的献身还是被迫的牺牲都算不上，而是由于即使低头认罪了也要被穷追猛打直到死亡的毛式“群众专政”的压力。这种废墟式的苦难因此无法开出原野里的生命之花；而能否开出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应召女郎，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一种近乎无耻的实用主义，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像一座粉碎机，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都包举以内而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毛成了最高的，那还有什么不是废墟呢。那时的中国，

真是没有立锥之地可供任何人“遗世独立”，即使亡灵也无从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生犹似、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他什么呢？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无知者无畏。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维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头上长角、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因为连他自己都是这一野蛮无耻无知无畏的仙人掌精神的产物。

五、毛泽东的“政治三P”

文化大革命多少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前夕的“国王——人民的联盟”相似，有其“三部曲”：（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后文革时代（邓小平改革期间）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一手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汉人社会的可悲在于：会两千年没有贵族传统了。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变成了：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按当时术语，这些叫花子出身的暴发户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党内资产阶级”。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中国并没有欧洲式的“国王”、“贵族”、“第三等级”，而只有“僭主”、“走资派”、“群众”在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闹剧中尽情表演。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毛泽东的”政治三P“(3 Persons)：1、毛本人；2、党的组织；3、革命群众。

这种“一龙二凤”的游戏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五四青年们十分热衷的活动。老毛对此当然也不会有丝毫的陌生。所以他一会儿拉群众打党组织，一会儿拉党组织打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性之所致则干脆“截断巫山云雨”。

（一）如果人民（革命群众）没有受到党组织的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就无法发挥动员作用（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的阴谋煽动就没有着力点）。例如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种种煽动就再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1976年老毛煽动否定周恩来，结果激起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二）人民（广大群众）如果不怨恨贵族（毛的干部），国王（毛本人）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这个政治三P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例如，1969年以后，毛和走资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把学生流放农村，说明“毛的政治三角游戏”已经暂时宣告结束。造反派被逐出三角游戏，三P变成了怨偶之间的无性婚姻。

（三）显然，只是因为毛和走资派（分别扮演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多，革命群众不过是毛泽东临时玩弄的野花——虽然家花不如野花香，但开起夫妻店的时候，家花却要比野花可靠。因此，镇压革命群众便成为毛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政治三 P 虽然相当无聊，但却有一项意外收获：使得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使民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官僚体系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苏联老大哥及其他共产仆从国家那里也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价值因此不在于文革的自我意识，不在于文革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文革使得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迄今还只在“行”的层次、没有在“言”的层次完成。

政治制度虽与文化、风气，心理等意识形态颇有关系，但毕竟是直接由文革这样的社会动静中择要总结而成的。尽管，中国从苏联模式下独立出来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中国终将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第三等级的革命，来建立一个现代宪政国家。而后人会认识到，中国脱离马列主义获得思想和政治独立的时代，是从文革的劫难开始的——这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道理？

（2006年5月16日 纽约城）

〔本文取自谢选骏正在撰写的新著《两个中国——第二南北朝的发现》的第十四章。〕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